



互联网上卖车皮

朱大建

理论是灰色的,生活之树常青。这是歌德的名言。生活是五光十色的,有些事情,完全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力。比如,呼和浩特铁路局一个受贿副局长马俊飞,任职22个月,受贿和不明巨额财产达1.3亿元,如何藏钱成为他最头疼的事,金条、美元、欧元、收藏品,堆满了两所房子,直到案发。据知情人士透露,马俊飞“老实本分”,无不良嗜好,自收第一笔贿款后就如坐针毡,不敢收,也不敢消费,这是马俊飞被轻判为死缓的原因之一。但我认为,这

些话,虽然反映出“潜规则”暗中流行的现实,但马俊飞这么说的目的,是在为自己开脱。因为,呼和浩特铁路局前后有5任正副局长栽倒在这个职位上,不可能全都怪罪客观。但一些客观原因的存在,让他们较容易栽倒是事实。7年前晚报《夜光杯》刊登过我写的一篇文章《资源与陷阱》,后在全国副刊评奖中获金奖。文章引用了一句“油水最多的地方最容易滑倒”的新民谚,意在说明,官员手中掌控的资源有两面性,要小心资源变成陷阱。比如,因运力紧张,呼和浩

特铁路局只要将煤运到秦皇岛,煤就升值一倍,客户只要将利润的一部分用于“搞定”那个审批车皮的官员,就能赚大钱。在汪洋大海般的众多市场主体面前,相信很多手握巨量资源的领导干部,受党的教育多年,有钢铁般的意志,能做到警钟长鸣,拒腐蚀,永不沾,油水再多,也绝不让自己滑倒。但万一要是一念之差呢?人吃五谷杂粮,有七情六欲,神经不可能时时绷紧,再坚强的人,也有脆弱的时候,也有弱点,万一被宵小之徒抓住弱点咋办?“扬汤止沸”不如“釜底抽薪”,

尽可能减少行政审批,是最好办法,凡是市场能决定的事,就交给市场,市场不完善就发育市场。后来,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,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。但是,市场不能解决的咋办?比如车皮,总不能像土地拍卖一样去竞价,那在运力紧张的当下,价格岂不要高到天上去?这就靠靠发挥好政府作用,而政府应发挥好制度作用,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,有权必有责,用权受监督。据报道,时任铁道部长盛光祖就在马俊飞滑倒之后到呼和浩特铁路

局,推出一套在互联网上卖车皮的制度,所有车皮都挂在网上,先到先得,就像老百姓在网上买客车票一样。据盛光祖说,如果运力紧张的呼和浩特局都能办到,其他铁路局也就没有推诿的借口了,这就等于装好“防滑地砖”,不怕滑倒了。为什么在互联网上卖车皮,就没有官员滑倒?网上网下,一字之差,却有质的不同。网上,就是所有资源离开了官员的手,放到一个公开透明的平台上,主动权在客户,人人看得见,人人能监督。网下,车皮就掌握在那个审批的官员手中,爱给谁就给谁,

主动权在掌握审批权的官员。看不见就无法监督,无法监督就可能让有审批权的官员想入非非心存侥幸,但“若要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”,最终,顶多也就像马俊飞一样,感慨“不收被视为异己,收了就如坐针毡”这般结局。所以实在没有必要抓住资源不放手,还是将资源放到公开透明的公共平台上妥当,于人于己都有利。从网上网下卖车皮有质的不同来看,互联网的作用,真的不能小看,人们对互联网的认知,真的是远远不够,互联网在公开透明行政上将大有作为。

忠诚如何高于法律

任大刚



战国末期的《韩非子》一书大约有三四百个故事,第一个便讲关于如何才算忠诚的道理。

话说楚共王与晋厉王在长平大战(公元前575年),楚共王的眼睛被打伤,激战犹酣之际,楚国将领司马子反口渴了四处找水喝,小厮谷阳连忙端着酒壶迎上去。子反一看是酒,骂道:“滚!怎么给老子喝酒!”谷阳答道:“这不是酒啊。”子反于是接过来喝了。哪知子反这个人一向贪杯,一喝就止不住,喝得烂醉如泥。战斗结束,楚共王召见子反,准备再战。哪知子反称自己心脏痛发作打不了仗,共王不相信,亲自驾车去看望他,刚进帷幄就闻到冲天的酒气,退出来叹息说:“今天作战,我自己受伤了。现在要依靠司马子反,但是他却烂醉如泥,这是他要让楚国灭亡,不顾惜我们这些人的!仗是无法打了,撤吧。”回来之后,司马子反被楚共王斩首。

故事叙述到这里,按照常理判断,司马子反临危之际,不能克制自己的嗜好而醉酒,贻误战机导致楚军战败撤退,应该承担最大责任,因此被斩首并不为过。受到谴责的,首先应该是司马子反。

但故事叙述人韩非子却不这么看。他认为,问题出在小厮谷阳身上,他不应该给司马子反喝酒。谷阳与司马子反不仅没有冤仇,反而对子反忠诚有加,然而正是这种忠诚,反而害了司马子反。韩非子因此得出结论:献上小忠诚,反而祸害了大忠诚。

韩非子硬把这个故事套进“忠”这个价值评判体系,大有破绽。谷阳作为一个小厮,如何可能知道楚共王的作战计划?谷阳作为一个小厮的本分,无非是哄主上开心,他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,理当受到表扬。韩非子本人在叙述

这个故事时,也没有说谷阳同样受到了楚共王的处罚,说明楚共王能分清是非。

因此正本清源地说,司马子反因贪杯掉了脑袋,他自己应该为此负责。那么第二责任人是谁?显然是楚共王!

军人喜欢饮酒,这是古今通例。楚共王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。此次大军出征,他应该制定相应的行军纪律,尤其对军中饮酒作出严格规定,并周知上下。但作为随军人员的谷阳,显然并不知道这项纪律。

而把韩非子的看法贯彻下去,必定置他自己于滑稽一幕。作为法家代表人物,遇到帝王和上级制造的违法事件或法制漏洞,便偷偷地剽窃法家思想,为他们网开一面,并调转枪头,责怪僚属不懂得如何表达忠诚。

“法学家”本人在他讲的第一个故事里,已经埋下了中国传统法制的标准模式:法并不高于一切,它与权术、威势处在同一量级,只是供帝王交替组合使用,可用则用,不可用则不用的一件统治工具而已。

用今天的观念来套古人,以今非古,不是历史的态度,不过如果古人的过时观念顽固地遗传给今天,这种非议就很有必要,事实上,韩非子的所谓“法制”思想,潜流于今,显现出来的便是这些年来颇为人们诟病的“选择性执法”。

何谓选择性执法?就是同样的罪错,在不同的地区、不同的人群身上,所使用的罪名、受到的处罚是不一样的。这样的例子非常之多。中国大陆地区本来通行的是一套法律,何以会有不同的执法结果?

看看中国“法学家”的老祖宗韩非子的观念就清楚了。在他眼里的法律,并不是用来制约楚共王和司马子反这种上级,而是对付谷阳这种小厮的,韩非子如果是这个案件的执法者,他一定会以“不忠”的名义,第一个杀掉谷阳。这不就是最早的选择性执法吗?

改变消费心态才能杜绝盗猎

朱绩崧



日前,国家林业局和海关总署在广州公开集中销毁了一批象牙,重达6.1吨,按黑市价,总价数千万元,遇难大象估计逾2000头。面对电视报道,很多观众会惋惜地问:何必?象反正都死了,留下象牙,拍卖给土豪,这笔钱可投入保护野生动物的事业啊。亡羊补牢的策略,有关部门何尝没考虑过,但最终决定销毁,且敲锣打鼓,就是要向黑市传达一个强烈的信号:国家绝不容许盗猎、走私象牙。

非法象牙贸易猖獗,其逻辑就是“有杀害,因为有买卖”。乍看是经济活动,按理说让市场调节就是了,犯不着政府干预。可如今不得不干预,一是因为公众对保护野生动物的迫切性已经具备一定的科学认识,加之倡导尊重“动物权利”,漫说那些大象恐怖的死状令人毛骨悚然,就是杀只猫、屠条狗也往往掀起微博一片骂声。另一个原因,则是上世纪末以来,非法象牙贸易已经完成转型:从单打独斗的“专卖店”模式发展成与贩毒、武器走私等其他团伙犯罪行为相结合的“百货店”模式。据统计,现在每年有近3万头大象遇难,约200亿美元的象牙利润最终流向恐怖主义的深渊。拯救大象,就是助力反恐。

其实,象牙制品从未禁绝,非法贸易之外,还有合法买卖。一些国家还与非洲产象大国签约进口象牙,希望通过此举把黑市挤垮。以我国为例,合法象牙制品都配有标签。然而,商人重利。顾客来买象牙,商家诱以折扣,留下标签,转身配上黑市货,接着卖。这样的歪脑筋,动起来毫无技术含

量,但含金量却高得惊人。数据显示,合法象牙贸易开展后,2010年来,盗猎大象案并没有减少,反而有增多的现象。那些看似国家认证的象牙制品,无法抑制消费欲望。许多人更是认准了象牙的稀缺性,以之为新兴的投资目标。

回顾“没有买卖,就没有杀害”这句野生动物保护口号,其主张已不是简单地从源头制止犯罪,而是在付出惨痛的实验性代价之后汲取的教训。销毁吧,宁为牙碎,这是最坏的条件下最优的选择。

向人类敲响警钟的,不只是盗猎活动锐减了野生大象的种群数量,甚至激发了它们的进化。早在1997年,海外就有报道,乌干达新出生的大象中,有15%不长长牙(非洲象雌雄都长有长牙,与亚洲象不同)。可以断定,这种“无齿”现象就是大象对盗猎的最后回应。在非洲,有些保护组织还专门捕捉大象,麻醉后锯断其牙,以免日后因其有齿而丧生。就在我写作本文之际,突然发现常用软件Evernote(印象笔记国际版)的logo里,那头大象也是无牙的。会不会,我猜想,软件设计者也在表达对大象未来命运的忧虑呢?

源于市场的问题,凭行政干预不能起长效。非洲离中国很远,大象离日常生活会很远,象牙制品离工薪阶层很远。拯救大象,只有改变特定消费群体的心态,让他们把欲望的眼光从珍稀野生动物制品上挪开,转投向不伤生命体的贵金属或钻石。然而,那些惯于把玩牙雕、使用牙筷的巨贾显宦,往往内心也充满了对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的冷漠。要他们改用木的、竹的、塑料的,又谈何容易?

从“楼堂”禁到“墓地”之后

李泓冰



目下颇有些“官不聊生”的味道了。

在人称“禁今年”的2013,决策层连出十余道金牌,从“舌尖”管到“车轮”,从“楼堂”禁到“墓地”,连月饼、贺卡、烟花爆竹都巨细靡遗。囚禁权力的制度笼子,正被细细编织,同时惩治官员的力度也堪称空前,去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18万余名违纪干部,光是违反八项规定的问题,就查处了24521起。

当官真的不容易了。有好事的媒体以“中央禁令对公务员影响”为题,随机抽取100位公务员调查,居然有93位受访者称“公务员不好当”,还有人表示受“禁令”影响要考虑离职。这个样本很低的调查,目前还不足为凭。到了2014年年底,倘若近年来热得烫手的公务员考试显著降温,回归平常,倒是可以让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,见出新一轮反腐的“啃石留印,抓铁有痕”,确乎起了史无前例的效用。

当官这事儿,一直让百姓在纠结中艳羡,在艳羡中纠结。

晚清名臣李鸿章有很多无厘头的传说。有一则是说他不满于族中一名晚辈的学无术,说像你这种什么都不会,将来也只有做官一途了。郑逸梅笔记中,记下李鸿章的一句名言,可为互证:“天下最容易的事,便是做官,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,那就太不中用了。”吴敬梓在《儒林外史》中也有一句著名的调侃,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,清廉为官,三年官囊亦有十万银两入账,厚利如此,不但超过成功的商

人,喝五吆六的地位更非商贾所能及,就难怪略识之无的人,都汲汲营营于仕途了。

回到现实,孩子们对国趋之若鹜,除了看好公务员的社会地位与职业稳定性以外,不外乎还有这样一些诱惑。政府部门办公条件优越,很多地方,最好最堂皇的大楼是政府,公务用车也很滋润。官当大了,官威也盛,抖点威风摆摆派头的颐指气使,看在孩子们眼里,也爽呆了。有时甚至还能凌驾于舆论监督、社会监督之上,仿佛当了官,就一切皆有可能。

如今,官员的好日子,开始岌岌乎可危,这或预示着百姓的好日子愈来愈多。某些官员的好日子,与易贪易腐相关,所谓“官仓老鼠大如斗,见人开仓亦不走”,其大摇大摆有恃无恐之状,已绵延数千年而不绝,不知让多少人愤怒过、抱怨过、痛恨过,结论往往是积重难返。

向最难的事痛下手术刀,目标是以制度的笼子限制权力,换取长治久安。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个新提法,叫国家治理现代化。纵观中国百年史,现代化的路走得艰难甚至血泪斑斑,其起伏纠结,往往和权力的嚣张无度相牵连,也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远未到位,从“管理”到“治理”,从权力运行的封建性到现代化,中国的好日子或才开头。

很多官员终于意识到,习近平一年前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,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”,这句话并非说说而已。如果官不聊生能换来中国好日子,换来中国现代化的骥骥一跃,就太值了。